

上海老作家文丛



李济生著

金巴怀 及其他

上海老作家文丛

李济生著

怀巴金及其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巴金及其他:亲情友情书报情/李济生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2

(上海老作家人文)

ISBN 978-7-5321-3629-2

I. ①怀… II. ①李… III. ①巴金(1904~2005)-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884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特邀编辑:高彦杰

美术编辑:王志伟

怀巴金及其他

——亲情友情书报情

李济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29-2/I·2778 定价: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一辑,共12种,包括:王炼的《执著追求录》、任大星的《婚誓》、孙光萱的《于细微处见功夫》、朱鹭的《舷窗集》、李济生的《怀巴金及其它》、邵伯周的《平凡的旅程》、徐中玉的《文论自选集》、徐开垒的《新时期文选》、钱春绮的《十四行诗》、曹阳的《情系万家灯火》、廖晓帆的《欢唱》、燕平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姓氏笔画为序)。这12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09年9月

目 录

忆四哥巴金	1
巴金与抗美援朝	17
这就是巴金	25
又见巴金	29
梦境成现实	33
“愿为大家活着”——贺巴金百岁大寿	37
书缘初忆——怀巴金	43
鲁迅的学生——巴金	47
清明幽思	51
巴金的编辑生涯	55
追忆萧珊	71
“人生不过是场梦”——追忆三哥李尧林	75
“寻根”杂记	81
甘为泥土的翻译家——汝龙	87
追忆诗人赵瑞蕻	93
深深的怀念——忆王道乾兄	97

患难识知己——忆罗荪同志	101
“惟君子能编君子书”——忆老友夏忠禹	105
辛笛大哥,您走好!	109
也忆梅林	113
送别左泥	117
好编辑,真君子——悼王仰晨兄	121
难以忘却的记忆——沙汀、艾芜百年诞辰有感	125
在英伦宣讲抗日的中国记者——再忆萧乾	131
忆金公仲华二三事	137
从陈彦衡想到陈富年	141
追忆吴朗西	147
悼贾植芳老哥	157
我看陈醇	161
话说黄裳	165
也来谈谈《雷雨》的发现	169
《巴金的梦》读后感	177
与会有感	183
读报有感	189
一缕情思	193
也谈巴金赠书	197
《来燕榭书札》书后	201
陈衡哲愤然离川	205
勿忘史实	207
牢记史实鉴往开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211
看电视剧有感	217
出书何必尽“豪华”	221

文本才是研究作家的沃土	225
珍贵的异国友情	231
藏书小记	235
文学翻译对新文学的影响——读书偶拾	239
巴金译事的袅袅余音	245
话剧忆旧	251
朋友,是一盏明灯——读巴金《怀念振铎》文有感	257
傅雷译事点滴	263
读报有感——关于茨威格	267
我的“知足斋”	269
笔名小忆	273
引人深思的私信——读《写给巴金》	275
编后语——代跋	279

忆四哥巴金

荏苒时光，倏尔即逝，四哥去世不觉半年多过去了。清明前一天去洋山深水港参观，立于大洋山之巔，面临东海，远眺浩渺波涛，心潮随之起伏，一片幽思陡然升起。去年11月25日他生日那天，他和珊嫂的骨灰落葬于崇明东海之滨。今天孩子们同样携带鲜花瓣再去海边撒花祭奠，寄托哀思。这时我想他俩早已顺着水波走远了。唯愿平安地抵达彼岸，把他俩的至真至诚之爱散留在远方那些不知名的所在，开放出灿烂的花朵。爱，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有了相互的爱，人们才会有和谐、幸福的生活。归家后心潮仍难平。他那仰卧病床时的双眼，不是半睁半闭昏昏然似睡的样子，就是大睁着紧盯屋顶、一副沉思苦索的容颜；还有那老张开的嘴、下颚不住地启合，似有话要说，却又发不出声的无奈的表情，总不时浮现我眼帘。好像他还是躺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忍不住低声唤道：“四哥，你好吗？”泪水夺眶、心房颤抖……他已走了，永远地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了。唉！但求能在梦中相逢。

还是2004年2月17日那天,我刚放下晚饭筷子,国燦忽来电话,说四伯伯病情有变,速来医院。赶到病房,只见里里外外一片紧张,人人面容沉重。我被套上一外衣,戴上口罩,蹒跚地走到病床前,只见端端泪水汪汪守在床边。我唤声四哥,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了。不过三、五分钟,即被搀扶出,凄然落座外室沙发内。九时过被劝回家休息。昏沉沉地算是过了一夜。清晨电话传来病情无变,终于慢慢地逐步转好。他又过了一关。原来是心率减慢引起肾功能衰竭,面临血透危境,全家人只望他能少受点苦痛折磨,听其自然地走向生命的尽头为好。出人意料,他不但安过险隘,还慢慢地平稳下来。太好了!我又照旧每周六下午按时去医院探望。虽不能走进病房,必然站在门口朝内高声唤他两次,然后坐于外室向小吴或小张询问病情状况。如果逢上那天他精神较好,又无别的情况,就不守规约闯到榻前,跟他讲上几句,稍立片刻,再行退出。有次他竟两眼大睁、闪闪放光地望着我,露出笑意。我高兴极了!天上不是也有颗同名星星时时发射出光芒照耀着大地么?看来他定会照旧平稳地度过即将来临的百又二岁的寿辰。这正是我们全家人的祝愿。

去年10月14日晚,我刚从外地旅游归来,国燦又来电话了:病情有变,嘱次日前往。15日下午二时去到病房,情况大异,人影幢幢,一片紧张沉重的气氛。国燦搀着我走到阳台上病室外的落地窗前,朝里望去,全是白衣人员走动,病床上的他面扣氧气罩,周边机械杂陈,抢救情景立陈眼前。已看不清他的面容了,显然他正经受着极其苦痛的折磨。心房紧缩,泪水即流,颓然落座在身后的小椅上。这时国燦正向立在窗内边上的俞院长询问情



2001年11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走近巴金”大型图片展。
为开幕式剪彩。

况。他们说些什么，我已听不清楚，不住引颈内望，总想看个清楚，立立坐坐，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毫无所得。疲累不堪，难以忍受，怀着一颗作痛的心，急急让小外孙女搀着冲过人群走出病房，去到医院大门口叫车回家静候一切。

不知怎的，近年来人总易于激动，难以抑制。是否人老了，感情脆弱，无法承受重压，更怕死别之伤？不少老友过世，总是避去灵堂送别。而今面临之哀更重了。

16日这天全在悬念与默祷中度过。17日晨电台播出神舟六号胜利返航，完成任务安全回落基地，佳音令人振奋。有此大喜，定能冲走他头上的厄运，又会慢慢转好的。他曾几经危境，全都平稳度过。他的生命力就是强啊。心存此想，精神稍佳，有了一线希望。晚七时半绍弥代国燄转告噩耗时，眼前的一丝微光又给抹去，一片漆黑，骤落冰窖，身心全冷，欲哭已无泪了。

23日下午三时赶至殡仪馆一小室内守灵，见他面颜微红，毫

无病色，一副安然沉睡的样子，去掉了来时的惴惴忧心。小林姐弟等再去大厅查看灵堂的布置了。邱俭取出相机留影，为我留下他这副安然的睡态。

24日的送别仪式，木然地立候在他身侧，答谢前来送别的人众。三时半被小周带出，这时才见到外面广场上全是人，一片肃穆沉痛气氛。好不容易擦肩接踵走出人群来到大门外，匆匆搭乘小郑的车子赶去嘉兴，参加第二天即将召开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又免去我护灵、送灵之痛。之后的日子里，一如既往地沐浴在专家、学者们的热情发言中，及旧友新朋的关怀里，更感受到祖籍乡亲的高情厚谊。他若有知，定嘱我代答：名实难负，愧不敢当。盛情不忘，谢谢，谢谢。

返家后方从不少报刊上看到送别会前前后后的种种情景，送别人众竟达五千人之多，实出我意外。在送灵出外时，有来吊丧的人竟伏身地上哀痛不已。睹此图片，能不无动于衷乎？这是读者对他的真诚的回报。

一次追思会上被邀最后发言，曾借弘一大师名句“悲欣交集”以解说我那阵子的矛盾心情：先是觉得他虽远去，总算摆脱了那有口不能言、有思无法表的六年多卧床苦痛生活，替他欣然；继又为亲人永逝的切肤之痛沉落于无法自拔的悲思中，有好长一段时间则徘徊在幻影杂陈的昏然梦境里。而今痛定思痛，往事浮沉，更感凄然。权借笔抒怀，吐出郁块，稀释心哀。

二

回忆1923年的春末，他远走上海求学时，我年方七岁，蒙蒙然不识离别滋味。那时大家庭犹存，几十口人共处，尚无多大变化。尽管有的长辈怪他性子孤僻倔强，恨他总不听长辈的话，斥

之为叛逆者、不肖子孙。我却少动于衷。直待知识稍长,读了他的一点作品之后,方才明白他原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痛恶封建礼教的专制独裁,深感同辈青年遭受不合理的迫害,生命等同草虫;更叹自己无力以助,遂而寻求理想,立志献身趋向革命道路,要做一个改革社会的革命者。慢慢的又发现他写出的小说竟然有那没多人爱读,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我读书的中学里就有不少同学是他的崇拜者。自然而然地引起我的尊敬,另眼看待他了。年事日长,逐渐认识一点世界,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因而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却从无直接的联系。

1941年春,他回到了阔别十八年的故里时,老家早已瓦解,连本房的亲人也处困境而又分居两处了。我恰在一偏僻小城工作,无力赶返省城与他相见。直到次年的夏天,我们才得机会重续弟兄情谊。这时我已从外县调来省城的银行分行供职,且借住银行单身宿舍内与人共屋。我们相见多在傍晚前聚于商业场的某茶馆里,往往是同辈数人。他的再次回答,主要谋求出版社的发展,筹建成都办事处。先是把我拉进出版社工作,继则要我想办法另租房屋把分居的家人重聚一起,至于家用则由他主要负责,便于解脱我后顾之忧,彻底脱离银行职务,全身心为他主持的出版事业献劳。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们之间不仅加深了同胞亲情,更建立了共谋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谊。

抗战时期的苦难生活,进一步清醒了我的头脑,他的为人处世也更给我留下了终身榜样。在一篇短文里我曾回忆说:“特别是在与他主持的出版社共事的十几年里,正当国难临头、极为艰苦的年代,出版社累遭厄难,受尽迫害,损失多多,……从未见他垂头丧气过,总是执着地默默无言,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工作。那种敬业、爱书、惜书的挚诚热忱,实在令我感动佩服。”那时他不只是白尽义务,有时还把自己的稿费也贴了进去。为了事业,为了

广大的读者,为了作家和译者,他真是付出了一切,满怀希望地朝前直奔。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还说:“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又说:“从事文化建设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

1944年初秋,湘桂大撤退。我从桂林逃难出来,辗转到达重庆,他亲来南岸海棠溪汽车站接我。面对无多言,庆得平安再见,深情在内心。珊嫂对我说:“巴先生知道你有去平乐游击的打算,是多么的担心你,现在见到你放心了。真高兴。”他还与我约定,八月中旬同返桂林处理后事,恢复业务。岂料战事突变,八月桂林大火,计划破灭,就此同留山城。

抗战胜利了。大家高兴了一阵子。复员的人莫不为找交通工具而苦恼。四哥更急。得三哥电告: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速来沪。好不容易十一月里他才赶到了上海。岂料三哥又病倒在床。当我们收到他发回的三哥病逝的噩耗时,原以为阔别了二十五年的弟兄,有了再聚的希望落了空,真是痛彻我心。又为他而担心,这时身怀有孕的珊嫂产期临近,盼他能尽快返回山城,少受一点两头牵挂、身心交瘁之苦。我们也可以多知道一点是什么病夺走了三哥的生命。

1946年初春,朗西哥正积极与他的合作界朋友筹建文化合作公司之时,命我先去成都结束出版社成都办事处,顺便探母,返渝后即去上海为公司工作。可是回到重庆没两天,四哥即对我说:“情况有变,你不用去上海了。我同朗西谈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仍由我全权主持,他还是负责筹建他的文化合作公司,今后互不干扰。文生社必须保存,一如既往。这是大家的共同事业,

既要对广大的读者和作、译者负责,更要对得起为它牺牲的死者。我们有我们的目标、走向,决不能轻易地改弦另张。重庆是抗战八年留存下来的唯一内地基地,是后援,必须存在。你留守下来,好好工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说实话,那时的土纸书几乎没有人要,大家都盼着早点见到昔日的白报纸精印的书籍。渝处得以维持下来,继续在内地为进步的文化事业作出一点贡献,还多亏沪社的大力支持。可惜的是1950年奉命结束办事处期间,未能顾及三年多积存下来的他写给我的近二百多封信,整整一抽屉,其中多是谈出版社复员期间的种种经过,竟于忙乱中被当作废纸处理掉了。至今让我深感遗憾和歉疚。它们的散失,不单是我个人的损失,而是丢掉了出版社复兴过程中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几多酸、辛、苦、甜,局外人是无法体会的。往事真不堪回首。

三

留守重庆三年多,为出版社事曾两次来上海,又都是借宿他家。朝夕相见,交谈多多,令我难忘,更感伤怀。恨自己那时少不更事,悔未用笔记下当日种种。而今时过境迁,旧事难寻,加以年老脑衰,往往记忆模糊。晚矣,痛哉!

1947年初秋,正当山城黑云压头、白色恐怖严峻之日,匆匆应召赴沪,商谈出版社业务。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冒险家乐园”、十里洋场的上海,真有多巴佬进城之感,五光十色令人目眩心惊,不知东西南北,陌生极了。记得一天从巨鹿路出版社回到霞飞坊正逢汪曾祺等人在,汪听说我刚从四川来上海的,很佩服我行动是那么的自在。其实他不知道我也是两眼一抹黑,仅仅认识巨鹿路到霞飞坊这条短短的路程而已。到后除了向他汇报了重庆的业

务和处境外,并把营救致侄出狱经过作了较为详细地补述。说明当时没有照他来函去找何迺仁兄帮忙营救,而是把希望全放在吴先忧大哥身上。实因吴任南林中学校长,该校是川军一唐姓师长创立的,吴受聘请而来乃唐家贵宾,进城办事都住唐公馆内,因而认识同住唐家的一位警备司令部的某军法官,关系较好,更利办事。李致只不过借住沙坪坝某大学宿舍内的一青年学子,因随手带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信封而被误捕。通过军法官的关系,没多久就给放出来了,并没花多少钱。要知道我们也出不起钱,原本是清贫的文化人。

眼看沪社复员才一年多,在他的主持下就此蒸蒸日上,又崛起于同业中了。令我高兴、佩服。过去大家的辛苦没有白干,前面又充满了希望。文生社在读者和作、译者眼里是素有信誉、独具风格的。

在沪社逗留了一个多月,期间还衔命去台北考察,谋求设办事处,终以财力不够、租屋价昂,无功而返。在台北也是借住在他的老友吴克刚家。吴当时任台湾省图书馆馆长兼台湾大学教授。不久即匆匆返渝。现在回想起来,事幸未成,万一当初办事处建成,继而留阻彼岸与大陆隔绝,后果当不堪设想。“文革”中四哥的罪名当更大了,必死于“四人帮”张春桥等人的毒手之下无疑。万幸!万幸!

1950年春,因解放战争与沪社失掉信息半年有余,二月初忽得朗西哥电,命速赴沪议事。自然这次依旧借住他家了。到后方知他已完全不问出版社事久矣。他知道了我来沪任务是结束重庆处业务后再来上海社工作。料定渝处的结束事宜必大有一番周折。首先告我,母亲和瑞珏姐随来上海的住处,定在他家,以安我心。返渝后经过半年多的忙碌,终于顺利完成任务,让渝处有善始而得善终,在同业和读者中留下好的印象,未负三年前他的

重托，我心安矣。

10月初全家老小五口平安抵达上海，四哥亲来码头把母亲和瑞珏姐接往他家。我自带妻女先暂住巨鹿路采臣哥家的一间宿舍内，不几日即迁往桃源路出版社一座石库门宿舍内的底层厢房。一住就是几十年。

四

五十六年里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里，虽不是天天见面，除了“文化大革命”前期隔绝了六年外，从未断过往来。话真不知从哪儿说起。记得他初去朝鲜战场后不久，即写给我一信，说对我的从事业余翻译事，一直没有过帮助，很感歉意。（因为几年前曾将自己的一部译稿寄他审阅，一直搁置在他那里未作答。）嘱我今后多向清源兄讨教，相互切磋，好好努力。其实后来我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俄苏小说无不得到他的关心与鼓励。我的《巴库油田》一书，还劳珊嫂仔细校订过。

1954年夏，文化生活出版社因劳资纠纷提前并入了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我也随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分配在新文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外文编辑室）任编辑。四哥很高兴地对我母亲说：“妈，你不用担心了，纪申已经成为公家出版社的正式编辑了，只要他好好工作，前途有望了。”十二年前是他让我辞去公家银行职务，转业到他主持的私营出版社工作的。这时他像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似的，大大松了口气。的确，直到今天退休多年的我，仍未与书断缘，这都与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由于工作，由于与他的关系，我认识了不少他的老友、作家与译者，受益匪浅，大长学识。其中有的人后来还成为我的知交、至友了。四哥素来看重朋友，珍惜友情。在文章里曾时时吐露胸怀

说：“我常常说我是靠朋友生活的……友情这个东西在我过去的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的温暖的心。”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得到过不少朋友（包括他的朋友）的关心和厚爱。我要说，我不单单是从他的作品里，更多从他的实际生活中，耳濡目染地感受到：他跟他的好友们一样有着一颗“金字般的心”，一颗极富同情的厚道的心。“施恩不望报，受施慎勿忘”，“宁可人负我，不愿我负人”。这是他做人的起码准则。往往因之也招来意外的麻烦不说，甚至还受到污蔑与诬陷。“文革”后不久，有次我同瑞珏姐还笑过他说：“老兄呀，你未免太温情主义了。”他笑笑，不答一词。

上世纪六十年代始正逢天灾、人祸的困苦时期，我先是下放郊区某公社生产队劳动，继又去奉贤县头桥镇参加“四清”工作。每次休假回家，他或珊嫂总要带我去文化俱乐部吃上一餐，改善我的生活。我在头桥镇搞“四清”时，他也在南桥镇总队近处蹲点，与金仲华、赵超构共住一室。我们见面时又多了一个话题。不过，这大段时间里他很忙，任务多。我又常在乡下，相聚之日实在太少。

五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紧锣密鼓气氛，已叫人不知所措。“破四旧”开始不久，连我这个普通编辑家里也深感危机重重，黑云压顶了。我爱人胆战心惊地私下把照相本里的萧乾戎装像（二次大战中欧洲战场的记者）和白杨抗战前期来蓉演戏时送我的便衣与戏装照通通取出，以及相关物件一并烧毁。我事后方知，也